

苏联语言学典籍汉译探原

叶其松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苏联语言学典籍汉译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本文基于对原著/著者、译著/译者两方面的研究, 可以表明: 原著内容都与国际语, 主要是世界语相关, 著者分别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译著分别是日语和世界语译入, 译著的数量是三部而非两部。苏联语言学初始汉译典籍的主题特点与苏联语言学、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相关。

关键词: 苏联语言学; 翻译史; 国际语; 世界语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国外语言学典籍的汉译和引介对于我国语言学建立和发展起到过巨大作用, 这是学界普遍接受的公论。(赵振铎 2000: 465) 据语言学史家考证, 我国语言学典籍汉译始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 译本来自英、德、法、俄、日等语言。(姚小平 2007: 27—43) 其中, 从苏联引进语言学典籍则肇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斯皮义多维奇(Е.Ф. Спиридович)的《言语学与国际语》(1935 年)、安德列也夫(А.П. Андреев)、德雷仁(Э.К. Дрезен)的《新兴言语理论》(1936 年)是最早的两部译著。¹(贾洪伟 2010a: 72, 2010b: 84; 王秀丽、梅涛 2013: 50) 这些是国内学者研究得出的重要历史事实。以其为基础, 本文力求探查苏联语言典籍汉译之原。

《说文解字》将“原”解释为: “水泉本也。”“原”也同“源”, 可表示“初始”之义, 也可表示“本原”之义。苏联语言典籍汉译之原包括: 俄文原著的庐山面目, 原著著者的学术背景, 早期译著的真实数量, 译著传入的时间路径, 译著选取的历史背景等。

2 原著与其著者还原

翻译外文语言学典籍, 首选名家名作。俄罗斯学者撰写的语言学通史(Шулежкова 2004; Алпатов 2005), 或是有关俄语语言学的专门史(Виноградов 1978; Березин 1979), 都未提到斯皮义多维奇、安德列也夫、德雷仁的名字。由此可以判断, 他们几位并不是俄罗斯语言学史上的名家。将三位著者的俄语名字输入俄语维基百科进行检索, 唯一能检索到的条目是“Дрезен, Эрнест Карлович”(德雷仁, 埃尔涅斯特·卡尔洛维奇), 对其的介绍如下: “俄罗斯和苏联语际语言学家和世界语学者, 苏联世界语者协会主席。”²该条目多少提供了与三人研究身份相关的一些信息, 即他们是从从事国际语研究的学者。

顺着这条线索, 在有关世界语研究的文献中, 找到余下两位著作的大致资料。斯皮义多维奇的全名是埃菲姆·菲奥法诺维奇·斯皮义多维奇(Ефим Феофанович Спиридович),

籍贯为白俄罗斯，出生于 1891 年，曾经的职业是记者，担任过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副教授，并在哈尔科夫国立语言研究所领导过语言研究的工作。（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1995: 300）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言语学和国际语》（*Jazykoznanie i mezhdunarodnij jazyk*），这本书曾被译成日语和汉语。（Haitao Liu 1998: 76—87）

安德列也夫的全名是安德烈·彼特罗维奇·安德列也夫（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ич Андреев），籍贯是乌克兰，出生于 1864 年，曾经的职业是法官，但对世界语和与其相关的语言学问题感兴趣，1929 年出版过《语言学的革命》一书。（Морэ 2008: 45）

与斯皮义多维奇、安德列也夫相比，德雷仁的名气要大得多。他不仅担任苏联世界语者协会的领导工作，还曾主持苏联的标准化工作，积极参与世界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在标准化、术语学领域同样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德雷仁是同我国世界语学界最早有过直接交往的苏联世界语专家之一。我国世界语先驱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中的一节“D 同志的家庭”和其后面几节所提到的“D 同志”，指的就是这位德雷仁。胡愈之对德雷仁做过这样的描述：“D 同志是工程师出身，共产党党员，有一个时期，曾任过政府要职。现在是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工业报主笔。V.O.K.S.（对外文化委员会）委员。他又是一个世界语运动的先辈，在欧战以前，他已是一个著名的世界语学者。”（胡愈之 1996: 365）德雷仁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是《世界共同语史》（*Historio de la mondolingvo*）（Haitao Liu 1998: 76—87; Alexeeva 2003: 63; Duličenko 2010: 150—151）该著的雏形是发表在《柯特林报》（Kotlin）203—204 期上的一篇文章，该文 1922 年经过修补后由苏联世界语者协会中央委员会出版，1925 年经过增补后再版，1928 年再版时增加语言学家马尔院士的前言。（Дрезен 2012）

可见，斯皮义多维奇、安德列也夫、德雷仁三人学术志趣的交汇点在国际语和世界语方面。语言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向来贬褒不一，其研究在语言学史上难留痕迹，也是顺乎自然的。

3 译著与译者解原

3.1 《言语学与国际语》译自日语而非俄语

前文指出，《言语学与国际语》一书有日译本和中译本，中译本有可能从日语翻译而来的。这一推断可以从该书中文译本的“译者序”中得以证实：“本书 1931 年出版于列宁格勒，乃苏联国立历史言语研究所与苏联世界语者同盟言语委员会共同出版。著者斯皮义多维奇（Spiridovich）。原名 *Jazykoznanie i mezhdunarodnij jazyk*（《言语学和国际语》）。日本人高木弘和井上英一译为日文，译者抱歉不习俄文，只好根据日译本重为介绍。”（孙伯坚 1935: 7）

可见，《言语学与国际语》并不是从俄语直接翻译而来的。对于《言语学与国际语》一书的译者孙伯坚，目前所知甚少。在该书“译者序”的最后写道：“译稿多承若水兄，不厌麻烦，详细校改。”（同上: 11）这里的“若水”应该是民国时期的日语典籍译者陈若水，由此可以推断，孙伯坚是日语方面的专家。

《言语学和国际语》1935 年出版以后，在我国世界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简称“语联”）创办的刊物《世界》的副刊《言语科学》在 1935 年 10 月号发表过一篇署名 S 的评论文章。该文开宗明义指出：“这是用科学的观点来处理言语学与国际语问题的著作中被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文章概述译著的内容，但其质量评价不高，称之为“庸拙的译笔，弄得非常难懂，有几章简直不能卒读”，译者“对于世界语是门外汉”，因此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把该书从原文再译一遍，至少作一篇详细的批评是必要的”。（S 1935: 74）

3.2 《新兴言语理论》非合著而是两部著作的组合

上文提到,《新兴言语理论》原著的两位作者分别撰写过国际语方面的著作,但两人分别生活在乌克兰、俄罗斯,并未有过合著的经历。《新兴言语理论》也并不是一部合著,而两位作者各自著作的拼合。译著的第一部分译自安德列也夫的《语言学革命》,其俄语标题为«Революция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Яф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академика Н.Я. Марра»,它的篇幅很小,总共只有 24 页。俄文版封面标有“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эсперантиста”(苏联世界语学者丛书)的字样。(Андреев 1929: 1)后一部分节译自德雷仁所著《世界共同语史》的第二章和最后一章,其俄语标题是«За всеобщим языком: Три века исканий»。译者将这两部分拼和后又赋予一个新的标题——《新兴语言理论》。

而且,《新兴言语理论》并非从俄语,而是从世界语翻译成中文的。译者在《新兴言语理论》的“后记”中交代:“在这里,特别要声明的是,本书全部都是从世界语(Esperanto,一种人造的国际语)中译出的。”(徐沫 1936: 113)

对于《言语学与国际语》这部译著,《新兴言语理论》的译者徐沫不仅知晓,还在译著后的“译者的话”中对前者作过如下评述:“言语学这一门科学,在中国,本来就很少有人研究,特别是新兴的言语学,简直还是一片荒凉的白地,——独特的创见和发明不必说了,就是从国外移植一点人家的成果进来吧,也还稀少得可怜,近年来,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关于进步的言语理论的著作,据我所知,只有辛垦版的斯必力徒维支的《言语学与国际语》一书,和其他在各杂志上发表的若干篇零碎短文。但这一点仅有的成绩里,还有许多是译得不能‘卒读’的,譬如吧,上面说到的孙伯坚君所译的《言语学与国际语》,我曾把中译本和世界语译本(论柴门霍夫的一部分)对看过。结果,说来真有点不忍:平均每页有六个地方!”(同上: 111)从评论内容和笔风看,徐沫和上文提到的 Š 君应当是同一人。

3.3 《世界共同语史》的曲折译路

《世界共同语史》的世界语译本是霍赫洛夫(H. Hohlov)完成的,由涅克拉索夫(N. Nekrasov)校订。该译本曾于 1928 年 10 到 1930 年 6 月在世界语期刊《新时代》上连载,全译本是在 1931 年在德国莱比锡 EKRELO 出版社出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对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从 1933 年就已经开始了。语联的刊物《世界》曾于 1933 年 3—4 月号合刊、7 月号、10 月号上刊发过标题为《言语的起源》、《言语的进化与变化》、《采用自然语作为国际语的不可能》的 3 篇译文,文章标注的出处都是德雷仁的《世界共同语史》,这三篇文章全都收入《新兴言语科学》之中作为第二部分的一节。而且,《世界》还在 1934 年 10 月号刊发介绍《世界共同语史》的文章,文中指出:“苏联世界语理论家 E. Drezen(德雷仁)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的结晶(原书叫 *Historio de la Mondlingvo*, EKRELO 出版)是从历史的科学的观点指出国际语运动之必然性的巨著。…”

这些文章的作者正是前文提到的 Š 君徐沫,他是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叶籁士 1982: 195—196; 胡绳 1998: 663)同一时期,徐沫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世界共同语史》的翻译工作,但译稿完成后并未出版。20 世纪 90 年代,在胡绳、叶籁士、陈原的努力推进下,又请杭军根据俄文版对译稿进行校对。全译本于 1999 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原在《译本序》中写到:“这部大书是他(徐沫)在三十年代初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来的,其中个别章节在叶籁士主编的《世界》杂志副刊《言语科学》上发表过——这通通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稿子一直未能出版。”(转引自德雷仁 1999: 9)

这样看来,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语言学汉语典籍数量应当为三部而不是两部,其中《言语学与国际语》是从日语译入,《语言学革命》和《世界共同语史》从世界语译入。其中,最早与国内读者见面的是《世界共同语史》的部分章节。

4 苏联语言学汉译典籍题目选取索原

最早译入我国的苏联语言学典籍都与世界语研究相关，这并不是纯粹偶然的选择。这与那一时期苏联语言学和我国文化运动的总体状况有着十分必然的联系。

4.1 世界语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语言学研究进入苏联时代，语言学史家倾向于将苏联语言学视为俄罗斯语言学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50年代，苏联语言学的显著特点是抛弃帝俄时期的所谓“资产阶级”语言学，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语言学家研究的惟一的思想武器。苏联的国际语学者也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建设的洪流之中，他们采取的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是运用国际语，主要是世界语建立一套全新的语言学原创理论，以斯皮义多维奇为代表。他曾于1931年写过一篇《为新的语言学而奋斗》的论文，开篇指出：“同世界语在工人阶层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广大群众中流传甚广相比，科班的语言学，一门用来研究语言领域所有和任何问题的学科，对世界语乃至整个国际语至今仍置若罔闻，这是令人啧啧称奇的。……同时，这门学科对语言的各种细微之处感兴趣，数以千计的著述不仅有关于语言的、少有甚至极少有人知道的土语和方言的，还有关于词、语气词、语音、字母等的。”

（C. Мопс2008：45—46）另一条则是安德列也夫等所秉持的，将世界语融入现有语言理论之中，而在马尔的“语言新学说”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占统治地位，这自然成为安德列也夫等的首选。

尽管路径不同，斯皮义多维奇、安德列也夫的研究都可置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总体之中，并且将这视为新兴的语言学。这与《新兴语言理论》这部译著的名称由来应该不无关联。

4.1 世界语与新文化运动

姚小平认为，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典籍翻译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其首要作用在于开启民智，普及学理，推广新知。（姚小平 2007：27—43）“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仅要求文学的革新，也要去文字的革新，后者的重要体现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的拉丁化运动的，即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化新文字取得汉字。世界语本身就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文字改革运动，它同拉丁化运动在很多方面是契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语和拉丁化运动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得到蔡元培、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支持。（侯志平 1999：242—243）

翻译世界语研究典籍还与20世纪30年代我国世界语运动的特殊历史使命有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世界语成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宣传武器。“三十年代初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一个转折时期。那时在中国世界语界出现一股新的潮流，对世界语的应用赋予政治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用世界语向国外报道国内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另一个方面，就是从收到的国外寄来的同类‘通信’和进步的世界语书刊中翻译一些有用的材料在国内发表。”（焦凤 1963：29）1931年12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同“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隶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不仅语言学研究成果，还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都是“语联”组织从世界语译入国内的。

当然，世界语学者同国外学术同行的联系是较为密切，熟悉其他国家世界语发展的动向，了解各国重要的世界语研究者及其著述。我国世界语运动重要先驱者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详细记述他与苏联世界语活动家德雷仁的会面经过。对于这位苏联同行的学术影响及其重要著作，国内世界语者在1931年已经相当了解，翻译其《世界共同语史》也就不难理解了。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对20世纪30年代我国翻译苏联语言学典籍的具体状况作如下总结：

(1) 苏联是我国引介国外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来源地之一，翻译的成果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

(2)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译成中文的著作共有三部，分别是斯皮义多维奇的《言语学与国际语》、安德列也夫的《语言学革命——马尔院士的雅弗语理论》和德雷仁的《世界共同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它们内容都与国际语，尤其是世界语研究有关，且被赋予“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色彩。

(3) 三部译著无一是从俄语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言语学与国际语》译自日语，《语言学革命——马尔院士的雅弗语理论》和《世界共同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译自世界语。

(4) 翻译研究世界语的语言学成果与我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化、社会背景直接相关，也成为那一时期苏联语言学典籍汉译的显著特点。

附注

1 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Андреев应译成安德列耶夫、Дрезен应当译成德列津。为避免多个译名造成混乱，本文保留安德列也夫、德雷仁的译法。

2 网址出处为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резен,_Эрнест_Карлович。

参考文献

- [1] Alexeeva L. Interaction of Terminology and Philosophy[J]. Terminology Science and Research, 2003, vol. 14.
- [2] Duličenko A.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artificial language at the dawn of early Soviet sociolinguistics[J]. *Russ Linguist*, 2010, vol. 34.
- [3] Haitao Liu. Interlinguistics in China[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1998, vol. 1.
- [4] Алпат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4-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5.
- [5] Андреев А.П. Революция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Яфе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академика Н.Я. Марр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ние ЦК СЭСР, 1929.
- [6] Березин Ф.М.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M]. Москва: Выш. школа, 1979.
- [7]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M]. Москва: Выш. школа, 1978.
- [8] Дрезен Э.К. За всеобщим языком: Три века исканий (Изд. 3-е) [M]. Москва: Удиторил УРСС, 2012.
- [9] Морэ С. Нов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эсперантистов в 1920 гг.: Выход из тупика? [A]. //Материалы XXXV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C]. СПб: Факультет филологии и искусств СПбГУ, 2008.
- [10] Шулежкова С.Г.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M].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4.
- [11] 德雷仁. 新兴语言理论 (徐沫译) [M]. 上海: 新文字书店, 1936.
- [12] 德雷仁. 世界共同语史——三个世纪的探索 (徐沫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3] 侯志平. 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M].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
- [14] 胡绳. 胡绳全书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5] 胡愈之. 胡愈之文章 (II) [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16] 贾洪伟. 苏联语言学汉译历史分期[J]. 中国俄语教学, 2010(2).
- [17] 贾洪伟. 苏联普通语言学典籍汉译大事记及其简析[J].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10(2).
- [18] 焦凤. 三十年代中国世界语者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些回忆. 文字改革, 1963(11—12).
- [19] 斯皮义多维奇. 言语学与国际语 (孙伯坚译) [M]. 上海: 新垦书店, 1935.
- [20] Š. 言语学与国际语[J]. 世界, 1935 年 10 月号.
- [21] 姚小平. 语言学典籍汉译史[J]. 辅仁外语学报, 2007(4).

- [22]叶籁士. 回忆语联——三十年代的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J]. 新文学史料, 1982(2).
- [23]王秀丽, 梅 涛. 国外语言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1911 - 1949) [J]. 法国研究, 2013(2).
- [24]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 叶籁士文集[Z].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5.
- [25]赵振铎. 中国语言学史[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Som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oviet Linguistic Literature

Ye Qi-song

(Russian colleg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15008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oviet linguistic litera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1930's. Exploring the Russian originals and their author,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their translator in this period, this paper yield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 Russian originals were devo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speranto in particular, and their authors were from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Secondly,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were made from Japanese or Esperanto, not directly from Russian language, and the first translation has three, not two as shown before. Thirdly, the choice for translation of the Soviet linguistic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as driven by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Soviet linguistics in the 1930's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Soviet linguistics;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speranto

作者简介: 叶其松 (1980—),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词典学。

收稿日期: 2017-04-29

[责任编辑: 惠秀梅]